

试论宋徽宗时期的西部拓边

王德利 王 鹏

(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)

[摘要]宋徽宗沿袭和发展了神宗、哲宗两朝的拓边政策,主要是通过武力手段开拓经营西部边疆,对河湟吐蕃用兵取得胜利,拓地三千余里;在对西夏的战争中,收复国土数千里,取得了很多实质性的胜利。客观而言,宋徽宗的西部拓边政策,对北宋产生了重要影响,促进了西部地区尤其是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,推动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,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重要意义。

[关键词]宋徽宗 西部拓边 河湟吐蕃 西夏

澶渊之盟后,宋辽成了“兄弟之国”,双方关系趋于缓和,西夏成为北宋的主要用兵对象。这期间西夏与北宋的军事对决又分为两个阶段:先是西夏对北宋不断侵扰,后是北宋在西部频繁拓边。学界对北宋的西部拓边事实已基本考证清楚^①,但对徽宗时期的西部拓边却多为概括性描述,缺乏细致深入的论证。本文立足前人研究成果,试图从政策制定、拓边经过、拓边影响入手,对徽宗时期的西部拓边做阐述。

一、宋徽宗时期的西部拓边政策

西夏与辽互为犄角,欲削弱辽国,必先制服西夏。针对西夏的积极拓边政策,在神宗时期形成,具体表现在:“欲取河西,当先复河湟,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……诸种既服,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。”^②其要点是,夺取西夏左厢横山之地,右翼熙河湟鄯地区,对西夏形成扇形的包围态势,阻绝西夏与吐蕃联合,制服西夏,彻底解除西部边患。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,北宋先在横山地区取得胜利,哲宗时期又武装占领河湟地区。

徽宗初立,从元符三年(1100)到建中靖国元年(1101),反对拓边的元祐派得势,绍圣党人曾布、章惇等遭贬黜。在元祐派首领韩忠彦主政下,于元符三年弃鄯州,翌年弃湟州。此时徽宗皇位未稳,尚需要安定的政治环境,故采纳元祐派建议。于是在徽宗即位的最初两年,北宋一直弃地求和,遂使先前的拓边成果毁于一旦。

但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,建中靖国元年(1101),徽宗皇位渐固。羽翼初丰的徽宗开始扭转现有弃地求和的方略,恢复神宗、哲宗两朝的积极拓边政策,对内打着熙丰旗号,恢复新法,对外力主开边进筑。崇宁元年(1102)七月,拜蔡京为相,遂“首兴边事,用兵连年不息。”^③十二月,借弃湟州罪,大肆排挤韩忠彦为首的元祐派,至此弃地求和的方针被终结。崇宁二年(1103),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职事王厚向徽宗上奏:“河南河北诸羌,以大小陇拶争国之故,人心不宁,诸侯酋豪,互有猜忌,遂更相侵掠杀戮,正所谓以夷狄攻夷狄,乃中国之利。臣见与童贯计议,乘此从长措置,俟起发别具奏闻。”^④介绍了河湟吐蕃内乱的情况,指出此时正是宋廷积极拓边的大好时机,这也成了徽宗日后用兵河湟,推行积极拓边政策的发端。

二、河湟易收、西夏难复 徽宗时期的西部拓边

(一)河湟易收。崇宁二年(1103)六月,王厚、童贯自熙州出发向湟州进军并获胜。“收复湟州并管下城寨周围边面地里共约一千五百余里,东至黄河、兰州京玉关,西至章峡、宗哥界,次西至廓州黄河界,南至河州界,北至夏国盖朱界。收复湟州并管下城寨一十所,通川堡、通湟寨、省章寨、峡口堡、

安抚寨、宁洮寨、当城、宁川堡、安川堡、南宗堡。招纳到湟州管下部族并户口,大首领膝令等二十一族,户口约十余万计,大首领余奘等五十余人,小首领把班等四百余人。”^⑤崇宁二年(1103)九月,兵向河南生羌,复河南三城。崇宁三年(1104)三月,克宗哥城。四月十二日,宋军至鄯州(即青唐)城下,龟兹公主青宜结牟以及豪酋李河温率回纥、于阗“班次”、诸族大小首领迎降,宋军入鄯州。十八日,入廓州,驻城西。北宋将鄯州改名为西宁州,正式隶属其管辖之下。

至此,“王厚所克三州及河南地土:自兰州京玉关沿河而上,取湟州临宗寨、乳酪河之西,入鄯州界管下宣威城,青海洗纳、木令波族,东南过溪哥城至河州循化城入洮州,复自洮州取庞公原,循山后出怀羌、来羌城,沿黄河过来宾城,上巴金岭、南谷,抵京玉关,拓疆三千余里。其四至:正北及东南至夏国界,西过青海至龟兹国界,西至卢甘国界,东南至熙、河、兰、岷州,连接阶、成州界,计招降首领二千七百余人,户口七十余万,前后六战,斩获一万余人。”^⑥河湟地区吐蕃政权不复存在。

(二)西夏难复。崇宁三年(1104),北宋在大力进攻河湟吐蕃的同时,亦在兰州和横山地区向西夏进拓。崇宁四年(1105)正月,宋兵三万五千人赴会州,筑城防御。西夏不甘河湟易手,围宣威城,并犯西宁州。宋军大败,知州高永年遇害。西夏又围湟州北番市城,知州辛叔献和统制郭祖德大力反击,杀敌千余人。至此战局急转,西夏攻势受挫进而退兵,由迎龙谷遁去。五月,熙河兰湟等路经略安抚使童贯遣都总管刘法率兵入夏国界,战场转至西夏国土,宋军开始全面进攻。破席江河、大铁泉两堡及马练川城。

西夏渐现败像,遂数次遣使让辽请求向宋施压。辽国也感到若宋军获胜,必将引发辽宋夏三国力量对比的失衡,于辽国不利。崇宁四年(1105),辽遣金书枢密院萧良出使北宋,言宋“朝廷出兵侵夏,今大辽以帝妹嫁夏国主,请还所侵地。”^⑦崇宁五年(1106),辽又派人使宋,“为夏请元符讲和以后所侵西夏地。徽宗曰:先帝已画封疆,今不复议。若自崇宁以来侵地,可与之。”^⑧在辽国的强力干预下,北宋答应归还崇宁以来所占夏地,双方关系遂有所缓和。七月宋夏休战,但宋并未归还所占夏地。直到崇宁五年,宋许夏和,废银州为银川城,罢五路经制使,徙陶节夫知洪州,至此徽宗西部拓边的实质性军事活动暂告段落,此后其主要军事目标是拱卫战争成果。

从崇宁五年(1106)至政和三年(1113),宋夏间保持了七年相对和平的局面。自政和四年(1114)至宣和元年(1119)五年间宋夏相互筑城争地十数次激战,互有胜负。宋在藏底河、古龙骨、仁多泉等战役中先败后胜,西夏则在靖夏城、统安城

战役中大败宋军。但总的来说,宋方略占上风。据徽宗御笔赐名,王安中所撰“定功继伐碑”云,宋在宣和元年(1119)六月班师时,凡青唐吐蕃辖区置州四、军一、关一、城六、寨十、堡十二,收复夏国地数千里,筑军一、城七、寨五、堡垒二十四。^[9]至宣和元年六月,西夏再次纳款请和,北宋的西部拓边活动结束。

三、西部拓边的影响及评价

宋徽宗时期的西部拓边,对北宋及其周边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(一)军事方面:扬威西夏、惠及南宋。在军事上,拓边的胜利,使北宋对西夏的优势更加突出,西夏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,被迫屈服于宋。北宋达到了兼治西夏、西患渐息的军事目的,稳定了西部边陲。

西部边境连年征战,亦锤炼出了北宋官军中的异数——西北边军。南宋初年,他们成为抗金主力。金兵南侵时即认为宋“独西兵可用”,因而为防范西北兵勤王“以粘罕(宗翰)一军下太原,取洛阳,要绝西兵援路。”^[10]李纲曾说:“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。”^[11]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也记载:“女真等军皆畏服西兵劲锐善战。”^[12]在南宋抗金名将中,吴玠、吴玠、韩世忠、刘琦等人早年均参与了徽宗时期的西部拓边战争,并立有战功。吴玠军更是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,西北边军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。可见,西北军为两宋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。

(二)政治方面:蔡京当政、加速亡宋。西部拓边的胜利,对北宋的内政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徽宗的西部拓边是党争的产物。元祐党人反对拓边,并以此排斥绍圣党人;而绍圣党人主张拓边,排斥元祐党人。拓边的接连胜利,使蔡京得势,并一直取得徽宗的信任,执政长达二十年之久,几与徽宗朝相始终。以蔡京为首及童贯、王黼、梁师成、朱勔和李彦,被时人称为“六贼”。“六贼”互相勾结,把持朝政,使北宋政治进入最黑暗、最腐败的时期。腐朽残暴的统治终于导致方腊起义,给与北宋朝廷以沉重打击,加速了北宋的灭亡。

(三)周边形势:互结盟友、形势恶化。西部拓边的胜利,使当时北宋的周边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,先后形成了两大对立集团。西夏在战略优势完全丧失后,为求自保,便加强与辽的联盟。辽为攫取最大利益,也强化与西夏的联盟,形成了辽夏结盟共同制衡北宋的局面。北宋为了对抗辽夏结盟,也为了实现其“收复燕云”的百年夙愿,便与刚崛起的金缔结“海上之盟”,约定夹击辽国。这样,在宣和二年(1120),宋金结盟之后,在中国大地上便形成了辽夏与宋金两大对立集团,这使北宋的周边安全形势急剧恶化,大战一触即发。

(四)文化教育:兴办学校、教化人民。西部拓边胜利后,北宋在新开拓地区开办蕃学,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。崇宁四年(1105)八月,宋政府以陕西新建之郡犹用蕃字,“令置蕃学,选通蕃语、识文字人为之教授,训以经典,译以文字,或因其所尚,令诵佛书,渐变其俗。”^[13]北宋在新开拓地区建立专门学校,开展与内地一样的科举应试式教育或有民族特色的蕃民教育,还对新投宋居民子弟采取了一些激励性措施。尽管蕃学的数量、教育范围和效果都很有限,但对于西北各族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事,因此其影响是巨大的。此外,北宋在对新拓河湟地区的经略中,还重视利用河湟吐蕃及汉传民俗、宗教文化,求得吐蕃民族对汉宋文化的认同,平息和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,这些措施推动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。

(五)社会经济:综合开发、影响深远。大规模的用兵,耗费大量财政开支,加深了人民的负担。崇宁五年冯澥上书曾指出:“陛下空数路,耗内帑,竭生灵膏血而取之。收复以来,何尝得一金一缕入府库,一甲一马备行阵?而三州岁用以亿万计,仰于官也,而帑藏已空;取之民也,而膏血已竭。有司束手,莫知为计。塞下无十日之积,战士饥馁,人有菜色。”^[14]

在农业方面,北宋在新占领的河湟地区,招募弓箭手屯田,疏浚渠道,扩大了耕地面积,缓解了当地军粮供应的紧张状况。同时使得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、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传入到这里,种植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,改变了当地单一的游牧生产方式,开创了农牧兼营的生产模式。

在商业贸易方面,深化了茶马互市的交易模式。未收复河湟之前,中西贸易的重要干道丝绸之路被西夏隔断,西域商人多改道柴达木盆地,经青海城东至中原,与宋朝进行商业往来,河湟地区成为联通中原与西域的纽带。中西商贾频繁往来于青海道,许多商品运至青唐城,青唐城一时成为中西国际贸易的一大中转站。由于此地不在宋朝控制区,商业利益多受盘剥,商旅商业利润多受截留。占据河湟,意味着北宋打通了与西域的陆上直接联系,从此北宋可以与西域诸国在此直接贸易,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。因此宋军刚攻下河湟的崇宁二年(1103),就迫不及待地地在湟州置茶马司,专事卖茶买马,将茶马互市市场进一步西移到河湟,接着开榷场、设互市,加强了这一地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,促进了中外贸易,短期内河湟地区就成为繁荣的商业地区。这些都有利于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,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重要意义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李华瑞《宋夏关系史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8年版;刘建丽《宋代西北吐蕃研究》,甘肃文化出版社,1998年版;安国楼《论北宋西北开边以后的民族关系》,《郑州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3年第1期等。
 - [2](宋)彭百川《太平治绩统类》,卷十六,《神宗开熙河》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,1984。
 - [3](元)脱脱等《宋史》,卷三五,《赵挺之传》,中华书局校点本,1977。
 - [4](清)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,卷八十八,宋纪八十八,《徽宗崇宁二年》,中华书局,1979。
 - [5](清)秦细叶、黄以周等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》,卷二十一,《徽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。
 - [6](清)秦细叶、黄以周等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》,卷二十一,《徽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。
 - [7]叶隆礼《契丹国志》,卷十,《天祚皇帝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,1985。
 - [8]叶隆礼《契丹国志》,卷十,《天祚皇帝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,1985。
 - [9]李华瑞《宋夏关系史》,第三章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8。
 - [10](宋)徐萌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,卷二十三,台北大化书局,1979。
 - [11](元)脱脱等《宋史》,卷三五八,《李纲传》,中华书局校点本,1977。
 - [12](宋)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,卷八十七,《绍兴五年三月》,中华书局,1988。
 - [13](清)徐松辑《宋会要辑稿》,崇儒二之十,中华书局,1957。
 - [14](宋)赵汝愚《宋朝诸臣奏议》,卷一四零,《边防门·上徽宗论隴西三州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。
- 作者简介:王德利(1985-)男,黑龙江历史文化旅游学院06历史学系在读;王鹏(1986-)男,黑龙江历史文化旅游学院06旅游管理系在读。